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二辑

DANGDAI ZHONGGUO TUSHUGUANXUE YANJIU WENKU

| CangShu Yu DuShu

藏书与读书

徐 雁/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

藏书与读书

徐 雁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与读书/徐雁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10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

ISBN 978 - 7 - 5013 - 3748 - 4

I. 藏… II. 徐… III. ①藏书—文集②读书方法—文集

IV. G253 - 53 G79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9543 号

书名 藏书与读书

著者 徐 雁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748 - 4/G · 757

定价 48.00 元

总 序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应用、共同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文集。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正好是 30 年。30 年中,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几位中青年才俊,或在这一年,或在这之后不久,陆续步入图书馆学的殿堂。虽然这些进步不能说就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研究无疑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成果是新时期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记录。也许有人会质疑,那些注重思辨考证的“纯粹”的研究有什么用呢?胡适当年就曾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考证古籍版本、研究藏书目录有什么用呢?这些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却

繁荣了学术文化。考证古籍版本,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思想;探讨藏书目录,有利于了解各时代藏书情形,也对今天的藏书建设有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从藏书、目录、版本等研究出发,还可以推荐图书、指导阅读。这几位中有不少致力于这种研究,也有不少还在致力于这种实践。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献信息资源的管理,更应当探讨如何让这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尤其是目录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它教给人们的便是学会如何在浩瀚的文献知识和信息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本领,拥有这种本领和能力将会终身受用无穷。如果读者能从图书馆了解到怎样读书、有哪些书可读、书以哪种版本为好、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哪些书需要精读、哪些书只需浏览,这样,可以说图书馆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中充分发挥了文化教育的功能,也可以说我们的文献学、目录学研究并非全然虚不可用。文献目录之学本来就是致用之学,而其所致之用,应该说正是这些方面。

这些中青年学者是正在成长中的大树。他们潜心钻研,开拓创新,吸取养分,并逐渐枝繁叶茂。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图书馆事业这片沃土,而图书馆事业也因他们的研究而变得生机勃勃。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终将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顶梁柱。是为序。

彭斐章

2008年2月于珞珈山

序

沈 津

年年圣诞,今又圣诞。过了圣诞,元旦也就指日可待了。人们又进入了新的“鼠年”,年岁则又增了个“一”。

大前年的圣诞夜,我还在伏案写《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的序,前年是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赶写《书城风弦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的序,而元旦凌晨还在写《书韵悠悠一脉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的序。我当时曾有慨叹,即使为自己的书写序,也是一件苦差事,因为它和写别篇文章不一样。我只有去年的这个时候最安稳,那是由于健康缘故,不容许我再坐在电脑前写稿了。

两个星期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托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姚伯岳兄转来邮件,嘱我为他的论文自选集《藏书与读书》写序,我力不能辞,便乘此圣诞休假,将其所转电子文本的部分内容匆匆快读一过。

中华人文广博而深厚,凝聚着先人的辛劳和智慧,而作为文化学术载体的文献典籍,更是汗牛充栋。“藏书”与“读书”这个题目,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藏书家、学者写过,更有好事者将这些“读书种子”的体会和经验之谈编辑成书,以使后学少走弯路。我非常服膺虞山张金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序中的一段话:“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绝业,犹弗读也。”

读书必藏书,藏书为读书,此乃古今藏书家及学士文人之心得。当然,若附庸风雅,只藏不读,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古代的藏书家就不说了,就拿清末至现代的傅增湘、叶德辉、周越然、郑振铎、唐弢来说,他们都是我素所敬佩之人,藏书虽有多寡,侧重面也有不同,然藏而读,读而研,研求然后著述,却是他们的共同点。且其撰述,无论是专著或者短文,都凝聚着知识和睿智,所以他们对中华人文是有贡献的,其著述直至今日仍是读书人爱读喜藏之文献。

我大概也算是和书有缘分的人,一辈子在图书馆里与书打交道,竟搞了近五十年的“书皮子”。

回顾过去,无论是在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还是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的工作就是管理图书馆里珍藏的古籍,数十年未变,这似乎也是命里注定。

每当进入线装书库,虽然没有沁人心脾的桂馥兰薰,但总会有一种莫名的芸香悠悠袭来,我游弋其中,摩挲典籍,时间长了,还真有一种坐拥书城、醉卧书丛之感,我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想藏身图书府之万卷琳琅中,化作小小蠹鱼常驻缥囊,目的就是一窥群书之奥蕴。但有所得,即献诸同好。“蠹鱼”,也寓有“啃书本”之意,清唐孙华《再叠随庵韵》有“衰年髣髴烛光余,犹向残编作蠹鱼”之句,这也是我用“书丛老蠹鱼”的名字在“新浪”(<http://blog.sina.com.cn/harvardduyu>)上写作“博客”的一点缘由。*

也正是因为成天和善本书、特藏文献打交道,同时哈佛燕京图书馆每年近两万种的人文社会科学新书进馆,重要学术著作基本不缺,目前六十五万册的中文图书,一千五百种的人文社科期刊,大到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小到普适学人的文史著作,开架借阅十分方便,因此这些年来,我并不刻意买书、藏书,家中之书也不过千册而已。这说明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做学问的条件,远比在上海、香港和台北来得便利。

* 据“程焕文的博文”(<http://blog.sina.com.cn/huanwen>)2007年10月23日之“日志”：“沈津先生长期追随学术大师顾廷龙先生左右,深得顾老真传……环顾海内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难以寻觅。这样一位资深望重的学长在‘新浪’开博,真是图书馆学界的一大快事!乐事!韵事!感谢沈津先生的无私奉献!”又说,沈先生“乃(竹帛)斋主崇拜之学术偶像,其道德、学问、才识、精神等无不令斋主终身望尘莫及……在此,强力推荐图书馆学界的朋友去阅读‘书丛老蠹鱼’,因为那一定是最好的图书情报学术博客之一”——录自《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6期,第60页。

年青的時候，为在业务上有所提高，除了古书版本的实践外，还曾大看其书，不少书是顾师廷龙先生指定读的，如《四库全书总目》。当时把所有的版本目录之书几乎全给读过了，《书林清话》竟读了两三遍。而今年岁不饶人，正儿八经地将一本书通读一过已是极少了，但每天仍要翻上十来种书，汲取若干条自己需要的材料写入书志，心里才踏实。而在夜间，还要写一点自己有兴趣而别人暂不会写的“豆腐干”文章，权充读书笔记。

所以我如今的读书，还不如说是“翻书”。

“翻书”是另一种读书法术，也就是看见有用的资料细读一过，然后复印，或记入笔记本，或输入电脑，待将来有机会再派上用场。前些时候，花了半年多的业余时间，翻了万余部线装书，居然见到了不少有关中国印刷史、中国出版史的材料，而这些材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且从未为研究者、撰述者利用过。

就以清代官府发布的“翻刻必究”告示来说，这在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仅有一张图片，而我所得竟有十张之多。看来，如不是有意识地去大翻其书，是无法知道“告示”的原件（石印）会在什么书中有，这也应了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一段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翻阅线装书也使我在学识上与长眠已久的先贤如晤如对，是我摆弄“书皮子”学问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读书方式。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大阅览室里有一“小瑯嬛福地”匾，是叶恭绰的手书，意谓“哈佛燕京”乃海外一方“藏书福地”，亦可见藏书者该是有福之人。有道是“人生一乐，莫过读书”。徐雁曾是“金陵藏书状元”之一，其雁斋藏书也有万余之谱，这其中令人眼明的是“书之书”——有关藏书、读书、访书、书评书话、藏书读书志、名家序跋集之类的专题。

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大凡平时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心有所感，均会有所记述。长期以来，徐雁教授对中国图书文化史的研究情有独钟，并深切关注与之相关的人和事。他也是慎思明辨、熔古铸今之人，厚积多了，字符也就落实到了纸面上，可谓“插架与腹笥俱富”，想来藏书、读书、著书，也是徐雁沿着前辈治学途径

// 藏书与读书 //

4

而勤奋笔耕的实践者。

这部以《藏书与读书》为名的新书,是他从廿余年来所写的百余篇有关中国书文化的学术文章中选编出来的。我对他述及的黄丕烈、叶昌炽、叶德辉等人的文章有着很浓的兴趣,也从中得到不少新知。我对他近年来所从事的中国古旧书业,尤其是“书估”研究也有兴趣,因为我原有写《新书林清话》的计划,但现在没有精力去做了。今年秋间看见他在“百度”的博客“秋禾书话”(http://hi.baidu.com/nj_XuYan)上贴出有关陈济川的一篇文章,便把陈氏送给日本人西田的一份签赠手迹,以及以前搜集来的翁同文《世界史上最早的中晚唐间长安出版商》等复印件都送给了他。

说来也巧,前两年我为台北《人间福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永芸法师的书也写过一篇序,那本书的书名却叫《哈佛燕京的沉思——你不要读书了》。“你不要读书了”,那是永芸师父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对她说的。星云大师为何如此说,读者自己思量去罢。

徐雁教授和我算是半个同行,他学的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学专业,现在南京大学讲授中国图书文化史的学问。可是我至今还没有和他握手相会过,只在他的著作中曾见其坐拥雁斋琳琅的照片。

回想起来,我注意到徐雁,并不是从读他的文章或著作开始的。好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家中的中文电视节目里,看过江苏电视台拍摄的人物专题片《读书人徐雁》,印象中有他回家乡太仓探亲,以及去直塘中学探望教过他语文的虞道元老师等情节。2005年元旦后,经来哈佛燕京图书馆做访问学者的姚伯岳兄介绍,知为其同窗,才通过几次电话,算是同好之间接上了“线”。他的著作已有十来种之多,我祝愿他不断有新的著述成果奉献给学术界。拉杂写此权当小序,不知作者以为如何?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廿四日圣诞夜
于美国波士顿塞慕维尔之宏烨斋

目 录

中国图书馆的古籍典藏保护	(1)
清代藏书家的仪型——天一阁	(15)
古色陈香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22)
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	(29)
叶德辉图书史著作三种	(39)
郑伟章的《文献家通考》和《书林丛考》	(52)
姚伯岳的《版本学》和《黄丕烈评传》	(56)
孟昭晋的《书评概论》和《书目与书评》	(64)
从《中国历史文献学》到《中国阅读文化史论》	(71)
书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后	(85)
克乃文在华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百年纪念	(93)
王重民创办北京大学图书馆学门的业绩	(116)
刘国钧在金陵大学期间的图书馆学建树	(141)
李小缘“爱馆如家,惜书如命”的专业主义精神	(172)
“书城风弦自有声”的沈津	(191)
由《学林漫笔》忆潘树广	(206)
读遼谷老人随笔说来新夏	(218)
嗣响“浙东学派”的傅璇琮	(226)
主要论著目录	(246)

中国图书馆的古籍典藏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籍亟需保护,我国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一九八三年七月,以张舜徽、朱士嘉等老一辈学者为首的武汉地区知识界,通过《人民日报》向社会发出了紧急呼吁^①。在此前后,国内一些大图书馆古籍部的工作人员也通过各种方式提交了我国古籍保护问题严重的告急报告。

保护遗存的中国古代典籍,已经成为我国的社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的典籍劫难史。所有遗存的古籍都已经作为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人民的珍视。据统计,我国遗存下来的古籍当不少于 80 000 种^②。这些古籍,如今分别庋藏在我国各地区各级图书馆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一般说来,图书馆对宋、元、明等“善本古籍”制定了较好的保护规则和措施,三十多年来,它们保护完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对建国以来一直忽视的一般古籍的保护,也已提到了日程上来,而且其情势极其紧迫。

我国的古籍,除列入国家级“善本”的 59 000 部左右以外^③,其余的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一般古籍”,即具有一定资料价值和文物价值的线装书。长期以来,这些古籍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科学保护,然而图书馆保存一切文化遗产的职能,却在有效保护入藏图书这一工作上得到具体体现。但是,我国图书保护技术的普遍落后,却决定了我国图书馆对一般古籍的保护几乎是零。

根据对入藏古籍六万卷以上的一些图书馆的调查,我们知道:我国图书馆古籍部的技术保护设备极其落后,保护手段仍主要停留在传统的典藏保护技术这一水平上;对图书保护、尤其是

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近于空白。再者,除一些图书馆对古籍保护工作较为重视,专拨部分经费于古籍修补外,一般图书馆均无专款用于该项工作。因此,古籍保护现状十分糟糕^④:

调查馆名	古籍入藏量	书库设置	保护现状调查
首都图书馆	300 000 卷	善本书库 线装书库	善本库是一幢新建小楼,夏天室温大大超过规定标准。线装库在平房,其墙壁泛潮剥落严重,雨天尤甚。均无恒温恒湿及除尘设施,书纸脆化严重。也无特别防鼠防霉措施。曾用 666 粉灭虫。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	(未详)	古籍书库	书库建筑通风条件较好,但无任何现代化防护设施。《大藏经》等古籍采用传统柜设芸草避霉法,效果良好。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170 000 卷	善本室 线装旧平装库	库内开始准备设立通风装置,入藏古籍一半以上未配加函套,尘积严重。无任何传统防护方法及现代化防护设备。
贵州省图书馆	140 000 卷	新辟:善本室 未设:古籍库	善本室新配了樟木书箱及函套板。一般古籍存放在图书大楼顶层,通风及隔热防湿极差,曾引起大面积虫蠹。
四川大学图书馆	300 000 卷	古籍书库	库内 50% 古籍被虫蠹过,《古今图书集成》等珍贵古籍以至无法翻阅,损失极大。已采用传统保护方法及“ C^{60} 辐照杀虫”技术,基本遏制了虫害。
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	90 000 卷	(未详)	曾因堆放过高、过密引起严重虫蛀,采用传统翻抖及药物均告失败,后采用逐一翻装“红丹纸”(借鉴万年红纸法)的方法,收效较著。

这是一个十分怵目惊心的情况调查!如果我们再不及时采取措施、迅速解决古籍保藏的有关技术问题,那么,我们先辈留下的文化财富,没有毁于战争、没有毁于兵火、没有毁于禁毁,却要为我们落后的藏书保护技术所毁坏!因此,迅速组织和开展我国

图书馆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通过以上六馆的反映和我们另外所做的一些调查,我们了解到今天我国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书库拥挤造成管理不善,极易导致书灾;库内设备落后,一旦发生水火灾虫灾,无科学措施迅速予以控制;经费不足,古籍装箱配函和修补工作无法进行。这些问题,在气候潮湿、地利欠佳的南方地区图书馆中反映更为突出。而国内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所能采取的对策,几乎都局限在对我国传统保护方法的沿用上,既无能力又无条件从事该方面的技术研究。

本文旨在针对国内古籍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概略介绍我国传统的古籍保护方法和国内外运用现代化手段保护古籍的进展,以供从事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者借鉴,并试图通过拙文呼吁有关部门迅速重视图书馆古籍的保护。

二、对古籍保护传统技术的继承

我国的传统保护技术,是由我国古代国家藏书机构和私人藏书家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主要用以对付水火虫害等自然因素给古籍带来的损毁。概括起来说,我国传统保护技术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1) 染纸避蠹技术;(2) 装帧保护技术;(3) 药物防害技术;(4) 建筑防护技术;(5) 古籍修补技术。

由于我国图书馆对中国古籍的特有继承,以及当前国内图书保护技术的现代研究还很薄弱,因此,这些传统技术在今天各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中仍广泛地沿用着。

染纸避蠹,是将具有驱虫效益的植物制剂染在纸上,或直接用于写书、印书,或作为附页装订入册,以防蠹虫侵入。早在公元一、二世纪,人们就发现了用黄檗(蘗)汁加工可以避蠹的“潢纸”。它在古代曾被广泛用于写书。“染以黄檗,取其避蠹”(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唐以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敦煌石室发现的写经,大多是用潢纸抄写的,一千多年来,它们保护完好,一直未见蠹蚀痕迹。

“潢纸”而后是“碧纸”。这是一种用马兰、蓼兰等药用植物制剂染成的纸。碧纸的避蠹成分主要是蓝紫色的结晶体“靛蓝”。

碧纸而外,在宋代还有一种运用较多的避蠹纸是“椒纸”。这是一种用花椒、辣椒的果实制剂染成的纸。其效果,据清末叶德辉《书林清话》的记述,知“椒味数百年而不散”、“永无蠹蚀之患”(《卷六》)。下及明清,在广东南海(今佛山)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新的避蠹纸——万年红纸。万年红纸是装订在线装书书皮和书底的护页。用万年红纸装订的书,避蠹效果相当好,因其药用效果和桔红颜色均可历久而不衰,故称“万年红”。据实践考察,这是古代中国最成功的一种避蠹纸。

我们今天图书馆古籍保护人员对上述染纸避蠹技术沿用较多的是万年红纸避蠹法。清代,万年红纸仅在广东一带流传使用,但如今,这种技术已推广到整个古籍易蛀的南方地区。据四川师院图书馆的报道,当馆藏古籍出现大面积虫灾时,他们借鉴万年红纸的经验,利用红丹粉(Pb_3O_4 ,俗称“砒霜”)、化学浆糊和水按比例调在一起,刷在新闻纸上,晾干后翻装入册,才逐渐遏止了长期以来无法彻底解决的虫蠹问题。该馆已翻装了《五灯会元》、《古逸丛书》等2 000多册线装书。这种成功的做法,目前已迅速在古籍虫蠹比较严重的一些图书馆中普及,使古籍避蠹工作有了一定的成效。

装帧保护技术,是指古籍借助于装订而采取的防止磨损、虫蠹的方法。我国图书馆的古代遗书,主要是线装古籍。由于线装书是软装,书脊袒露在外,极易遭到虫蛀、鼠咬和蚁蛀。为此,古代藏书家们便发明了函盒来保护它们。函盒,又称函套,有纸板和木椟两种,可以防止有害生物的侵入。纸板的函套是以硬纸板做里,糊之以布或缎,分蓝布套、锦套等几种。一般说来,北方气候干燥,古籍用这样的函套无妨,而南方则不同了。因浆糊为书虫提供了良好的栖身地,极易引起虫蠹。因此,应用木制的书盒较好,但其用木极有讲究,大致是书盒要用檀木,书夹板要用楠木,书箱要用樟木,书柜则非赣杉、川柏及银杏木莫属。这都是藏书家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很值得我们借鉴。只要用木适当,那么其保护效果是会很好的。据叶德辉《藏书十约》中所记:“宋元旧刻及精钞精校,以檀木、楠木为匣装之”,而清代故宫文渊阁藏书正因“函以木椟”,数百年后“尚无风伤虫蛀之患”^⑤。

我国图书馆由于经费普遍不足,建国以来,只是陆续给一些珍善本添置了函套和书箱,但对一般古籍一直无力顾及,任其尘封老化,这对线装书的长期保藏和流通使用十分有害。在北京师院图书馆的线装、旧平装书库里,有一半以上的线装书“袒胸露背”地搁置在书架上,无钱予以配函。贵州省图书馆只是在近几年,才陆续给馆藏善本书“穿衣戴帽”,皮置到新制的樟木箱中。我们说,无论是从保存文化遗产还是供长期阅览使用的角度来看,至少为每一部古籍配函配套,都应是目前各图书馆责无旁贷的任务!古籍是一天天地老化下去的,而其历史价值却与此同时不断增加。如果我们今天不趁早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不仅会愧对先人,而且也是会有罪于子孙的。

药物防害技术,这里是指加置在书本、书柜和书库里,防止和消灭有害生物的药物。在古代,药草避蠹是一种被公私藏书库普遍运用的方法。药草避蠹,即是采集具有驱虫避蠹功用的植物叶片夹置在书页里或搁置在书箱(柜)里。这种药草,记载最多和运用最广的便是芸香草。宋代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所记“古人藏书避蠹用芸”,《群芳谱》所记“(芸香)置书帙中去蠹”者皆是。其他药草避蠹,如夹放烟草叶、荷叶等,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藏书家们还有不少民间土法可供借鉴。如皂角炒末避鼠,炭屑锅锈除蚁,或置雄黄石灰粉避虫蚁,或置肉桂、香油避虫等等^⑤。

药物防害,是一种简便易行的古籍防护方法。使用得当,可同时具有防书虫、白蚁和老鼠之害的功效。我国古代藏书楼和近代图书馆采用的防害药物,往往都取自天然,这正好代表了图书保护第一代药物期的保护水平。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进入第三代药物期,它以无毒、无污染药物为代表。目前,国内的药物防害尚处在第二代药物期,如放置樟脑精、喷洒 666 粉等。但是,沿用传统的药物防害方法,有时会起到现代药物所起不到的作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古籍库、浙江天一阁藏书楼,直到今天,还放置芸香草避蠹,效果显著。除此之外,国内许多图书馆都采用过烟草液浸纸防潮,收效也不小。

在古代,水火历来被认为是藏书的“天灾”,视为典籍的一大厄。因此,古代藏书家十分重视建筑防护技术。汉代伊始,以“金

匱石室”来收藏皇家文献档案,收效卓著,即成为藏书保护建筑的典范。明代所建“皇史宬”便极尽模仿。在私家藏书楼中,则以浙江鄞县范氏天一阁的建筑为表率。据说它“纯用砖甃,不用木植,故不畏火烛”,成为范阁图书久藏的建筑保证。为此,不少私人藏书楼争相仿效,即如清王朝为藏《四库全书》所建的文渊、文澜等“七阁”也予借鉴仿造。另外一种“徽州库楼式”的藏书建筑,因其“四围石砌风墙”可以在人烟密集处起到隔离火种的作用,而影响较大。在建筑藏书楼时,古人还考虑到了古籍的通风、防潮、防虫等问题,因此藏书建筑多建成楼阁形式。

随着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和平,水火已经不再成为今天我们的图书馆藏书的灾害。而且随着现代建筑的发达,防火防震问题都已基本解决。尽管如此,图书馆建筑,尤其是古籍书库的建造,目前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没有考虑到古籍收藏和保护的特殊要求。一般说来,南方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在缺乏现代化空调设备时,不宜设在图书大楼的顶层和底楼,至于把古籍藏到地下室,更是大忌。适当借鉴古代的藏书建筑对于建设今天图书馆的古籍书库仍是必要的。

除了上述问题外,对于古籍还存在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即破损、霉烂古籍的修补。根据前人的经验,修补古籍要用防霉浆糊:“用寒食面、腊月雪水为黏则不霉”(《后山谈丛》),“修补古书,浆黏中必入白芨,则岁久不脱”(《梅谷随笔》)。讲究在浆糊中加入椒液、藜芦、藿香、楮树汁、百部草末等,“庶可免蛀”(《书林清话》),都是一些颇有见地的论述。这样,古籍一经修复,即可长期使用。否则,易坏常修,反而有损古籍。另外,修补古籍需遵循“整旧如旧”的原则,而不是“整旧如新”。

“整旧如旧即是为了保持书籍的原始面貌和风格的装修方法”^⑦。古籍是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成果的统一体,因此,它除了学术资料价值外,还具有作为“古书版本”的历史文物价值。这两点,只有通过“整旧如旧”的修复工作才可达到统一。

当前,国内古籍修复问题不少。修补古籍的款项固然是一大问题,但古籍修复技术的后继无人,更是令人担忧的事。北京地区尚有一批中国书店的修复师傅可以借用,但终是年龄高迈。北

大图书馆古籍部一位修复师傅退休后,现在只剩下接班不久的一两个新手了。北京图书馆也只剩得屈指可数的几位老师傅。外省图书馆的情况更差。有的图书馆建国以来,从未对破损古籍作过修补。记得前几年,北京图书馆组织了一批力量举办了“古籍修补技术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技术力量,有了相当的成绩,看来今后还是坚持下去的好,及时把这些行将绝迹的手工艺技术抢救下来。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是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辅助。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的古籍保护技术是极其丰富的,其中有不少地方可供我们发掘和继承。我们认为,研究我国古代的藏书保护技术对于今天图书馆古籍保藏工作是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的。“首先,可以古为今用,为我们图书馆特藏书库和善本书库的藏书保护工作提供直接的借鉴”,“其次,研究我国古代典藏保护技术还可以使我们知古而创新,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促进对藏书保护技术的研究”^⑧。

关于前一方面,上文已多有叙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后一个问题却是图书馆界提交给科技工作者的一个迫切任务。如果能对中国古代的藏书保护经验作以系统、全面的科学分析,从古代用于染纸的植物制剂中提炼出防霉剂,生产出可以避霉的印书纸;或者对传统的防害药物作科学实验,制造出新型的防霉防蚁防鼠药物,那么都是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功德无量的贡献。近据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报告,他们已摸索到了复制防霉纸的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四氧化三铅研细,加入添加剂和桃胶溶液,用水调匀,制成桔红色涂料,刷在纸上,阴干就成为防霉纸。这些防霉纸用于珍本图书,取得一定的效果。”^⑨

可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图书馆界和科技界对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还处于模仿、沿袭和个别突破阶段。这同我国图书保护现实的迫切要求相距甚远。因为国内不仅仅古籍面临保护的问题,解放前出版的旧平装书的保护也已十分紧迫。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十万册旧平装书,至今已有 30% 被虫霉蚀,何况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个馆的个别现象。

在对我国古代传统的经验予以提高和创新的同时,借鉴国内